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从国际政治 到世界社会

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

郑安光 著

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国家结构。

然而这一结构在局域化和全球化“分合趋势”日益发展的“后国际政治时代”正在发生意义深刻的变革。

国家权威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进化”。

本书试图超越对世界政治的传统研究路径，

而将治理的主体、制度和观念置于全球化情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从国际政治 到世界社会

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

郑安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控制 / 郑安光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 朱瀛泉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746 - 5

I. 从… II. 郑… III. 国际问题—研究 IV.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729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书 名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
——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

作 者 郑安光
责任编辑 杨金荣 莫永明
责任校对 吕元明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2 字数 327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746 - 5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朱瀛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局面。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足于过去的“国际政治”。18 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今 200 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而生长发展,是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同国家战略目标与和平发展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过去的 30 年间,我国这个领域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自觉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是增强了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的意识,二是致力于建立学术研究与国际关系实践中新问题、新趋势的联系。这些努力使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保持了应有的活力。而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与外部世界交融的日趋密切,我们的学科建设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上,创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的愿景。我们知道,世界政治是一个连续性和可变性并存的社会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国际体系是怎样变化而且要说明应该怎样变化,因而它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实践与命运、具有规范性研究特性的学科。美英等西方国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时间比较长,基础理论发达,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在学理上认真学习借鉴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特别是主流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经验及其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构建起来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思想判断上的偏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作为理论思维的指导,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化之路不能重蹈西方的老路,它完全有可能建立在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结合并以此来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以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规范要求。任何的学术进步和理论创新只有在扬弃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惟有循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会实现共同的愿景。

这套丛书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依托国家 985 工程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而组织筹划,并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从 2009 年起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出版,既受泽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之优良学统的浸润,更得惠于丛书作者们之激奋于时代和国家

发展的感召。该丛书在意旨以全球视域为基点,结合有关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着重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体性、20 世纪以来的国际史、全球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大国外交和战略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历史和现状三大方面的领域。我们希望,这套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丛书的出版,将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事业有所帮助。是所望焉,谨此序。

2008 年 10 月于南京

前 言

20 世纪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宁和急速变革的时代。在这个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经历了从农耕时代向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直至电子时代的变迁,经历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竞争。在 20 世纪肇始和勃兴的国际关系学,它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与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些史诗般的变迁息息相关。因此,如何理解我们时代的全球变革,从中发现指导认识的规律,成为探索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的权势角逐演变成两极对峙,并且由此形成了加诸全世界的冷战体系。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国际政治态势,为现实主义理论在英美国际关系思想界的重现和发展提供了沃土。^①而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新现实主义)因其对这一世界政治态势的强大解释力,而成为冷战时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②从而,“冷战”这一具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词汇成为这个时代的标签。在冷战结束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现实主义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的前二十年里,权力(power)被认为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概念。^③这一时期,E·H·卡尔、马丁·怀特和汉斯·摩根索是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代表,而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则成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 页。

② Martin Hewson and Timothy J. Sinclair,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in Martin Hewson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3.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17 页。

为国际关系学界的圣经。^①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以肯尼迪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为分水岭,美苏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美苏关系的模式相对固定下来,冷战的不可控制性大大降低。^②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均迅速发展,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NGO)等非传统世界政治行为体不断涌现,环境生态等问题也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以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致力于理论的创新,^③提出了注重制度与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20 世纪 70 年代,基欧汉和奈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存》^④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大胆探索,由于它的重要影响,甚至被称作“(20 世纪)70 年代的《国家间政治》”^⑤。由此,“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新焦点。在这一基础上,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基欧汉的名著《霸权之后》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异军突起。至今,以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仍十分兴盛。

可见,国际关系理论直接诞生于变革时代的国际政治实践,正是基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知识变革与秩序的理解,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概念化和哲学化,才形成了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系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反过来,全球变革的理论化思考又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成为人们解释和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态势的一种重要工具。新近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正是深刻理解当代全球变革的一个理论硕果。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人类社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48—1978 年出版了若干版本, Kenneth Thompson 的修订本: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② Ralph B. Levering, *The Cold War: 1945—1987* (Illinois, Harlan Davison, Inc., 1988, pp. 99—101)。

③ 倪世雄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3 页。

④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1989, Pearson Addison Wesley, 2000)。

⑤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7), pp. 725—754。

会和世界政治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可以说,冷战那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戏剧化终结方式,本身就是这种变革的明证。从那时起,全球化开始朝着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不论是从生产的全球分工、消费的跨国流行,还是从世界金融体系的敏感关联来说,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变得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是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环境恶化、对人权的关切、非法移民、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的凸现。这些问题领域(sphere of problems)的超国家性大大激发了人们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反思。与此同时,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卫星电视、传真机、微型电子计算机和国际互联网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公民个人和 NGO 的政治技能,扩大了他们的信息来源,提高了他们的行为影响力。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变革和我们现有的世界政治理论分析工具之间的龃龉,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语中的地指出:“简单来说,我们的战后(国际)制度是建立在国际性(inter-national)世界基础上的,而我们现在却生活在一个全球性世界中。”^①

因此,探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要务,就在于正确、透彻地理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唯有如此,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才不致偏离了方向,才能在理论化的基础上指导我们的政治实践。全球治理理论正是理解这种新的变革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它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传统的主权国家范畴之内,甚至也不是单纯的“国际政治”的研究。它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政治的宽广领域,在这种更为宏观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理解和把握新的全球变革。

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上,全球治理理论一方面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对以往看似确定无疑的理论概念进行新的分析和认识。例如,传统理论认为,主权国家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中心,全球治理理论则对国家中心论的设定提出了质疑,认为随着上述新的全球变革的发展,尽管国家在世界政治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大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NGO、国际制度甚至个人,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国家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侵

^① Edward C. Luck, “Rediscovering the State,” *Global Governance*, Vol. 8 Issue 1 (Jan-Mar 2002), p. 7.

蚀”，并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理论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截然分开的，两者有着不同的规则和规范，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便不是没有，也是微乎其微的。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国内—国际事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其影响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更加重视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世界政治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的概念，并构建出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全球治理理论在对世界政治的分析中，重视 NGO、社会运动等公民社会的力量，认为它们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不断获得自身的权威，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治理作用。总之，全球治理理论为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途径。

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中，全球治理理论为解决世界政治中一些重要的公共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尽管从本质上说，全球治理理论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但是它的独特视角的确为我们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途径。如前所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越了单一主权国家的司法范围，单一主权国家甚至是多个主权国家的能力，都已经不足以成功地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组织和个人所共同面对的难题，是必须作出某种反应的全新挑战，它们和全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息息相关，能否合理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未来。为此，有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变得十分必要。目前，在全球环境、气候变化、人权、反腐败等领域，全球治理已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选择。在这些领域中，单独依靠主权国家权威已经无法获得良好的治理效果，而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往往会大大推动问题的解决。这个治理体系不仅包含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还包括 NGO、社会运动和行动网络等公民社会力量，这些不同向度的权威的共同参与，大大缓解了因主权国家权威的局限性所带来的治理困境，推动这些问题向着一种良好治理的方向发展。

本书的基本框架分为三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第一至三章，该部分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基本理论架构和思想发展进行一些梳理。探讨和分析了全球治理理论出现的理论和现实背景，辨析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治理、全球治理、权威领域、公民社会等。试图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来明晰地界定全球治理理论的理论范围和边

界。进而分析了全球治理论的本体论、基本范式和方法论,从最本质的理论构成的角度,对它的理论框架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并通过把它和当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比较,分析并界定其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第二大部分包括第四至第六章,该部分试图通过把全球治理当作一个分析工具,来探讨和分析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问题。以此来检验全球治理论的实践意义,并从中找出它的理论优势和弱点。在这部分里,首先说明了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作为一个“案例”或者说分析对象的意义。其次回顾了传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主要理论,指出其理论局限性,及其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实践的消极作用。最后,通过权威领域、制度网络和观念认同三个层次的分析,来理解和认识全球治理对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作用和价值。第三部分为第七、八章。这两章对全球治理论以及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球治理进行了总结,对全球治理论进行批评和评价。尽管全球治理论是一种正在发展的“未来的”理论,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为世界政治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而且对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对全球治理论基本概念的分析入手,梳理和描绘出全球治理论的主要理论脉络。为了对全球治理论的理论作用进行分析和验证,本书选择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问题作为分析的对象。尽管如后文所述,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全球治理的研究,除了理论本身以外,多集中在环境、生态、人权、反腐败、金融等“低政治”领域,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等传统的“高政治”领域则着墨不多。本书通过对这一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分析表明,即使在“高政治”领域,全球治理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从而证明,全球治理论不是像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深刻的理论思想。

基于这种考虑,本书对全球治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试图给出一个总体性理论框架,同时通过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治理的分析,进一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找出它的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的重点所在。笔者觉得,本书有以下特点和新意:

一、比较系统地梳理全球治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思想来源。

分析它出现的现实政治和学术发展背景,其主要思想脉络,基本思想等。

二、通过对全球治理理论和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比较,分析它的理论价值和不足。进而重新认识和评价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新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探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尺度。

三、本书提出了未来世界政治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能的路径,即从国际政治向世界社会的转向。这对于从根本上把握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本质,塑造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四、首次比较系统地对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中的全球治理进行研究和探讨,试图找出解决这一当代全球重要安全问题的若干有益途径。在具体的现实政治层面,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说明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全球参与和制度创新以及观念变革的重要性,反对“新帝国论”下的单边主义行为,指明依靠联合国体系、巩固和加强现有制度、充分动员全球公民社会以及注重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五、加强了对一些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世界政治因素的研究,如十分重视分析 NGO、社会运动等公民社会力量的分析,试图从中找出可以表明未来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蛛丝马迹。同时,本书的分析中,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中,几乎不把科技当作一个有意义的变量进行研究,往往忽视它对世界政治的作用。而在本书的分析中则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微电子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面貌,推动着全球治理的出现和发展。

关于当代世界政治体系及其变迁,美国著名的国际法和世界政治研究学者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公允地评论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塑造的主权国家边界现在在世界舞台上依然可以界定出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但这些行为体不能被确定无疑地看作是书写我们时代历史的根本性力量。^①的确,主权国家体系以及由它所塑造的国际政治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全球治理理论既是这种变迁的结果,也是推动这种变迁的

① Richard Falk, "(Re)Imaging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ization," in Alex J. Bellamy, 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0.

巨大动力。就像所有的社会科学概念一样,国家主权从根本上来说,既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谈论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在世界上如何行事的方式。它是政治语言的中心,同时也是语言政治的中心。^① 既然如此,它就不是“不朽的”,必然会随着世界政治现实的变迁而变迁。今天的世界政治图景似乎正在呈现出这种进程。当然,全球治理理论不可能是预言这种变迁未来的“特尔斐神谕”^②,但它无疑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发展的方向给出了一种既符合逻辑又可能的演变路径:从国际政治向世界社会的进化。

① [澳]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页。

② 古希腊社会有一个著名传统,每逢重大事件或疑难问题,总要向位于特尔斐城的阿波罗神庙中的神使(由一位少女担任)询问由她负责传达的太阳神阿波罗的神谕。

目 录

总 序	i
前 言	001
导论 超越国际政治时代的全球变革——全球治理及其理论化	001
第一节 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跨越冷战的 国际关系理论思考	001
第二节 全球化冲击:理解冷战后的全球秩序与变革	013
第三节 全球治理研究现状述评	030
第一章 从治理到全球治理:基本概念和理论辨析	046
第一节 治理和全球治理:概念梳理与分析	046
第二节 从本体论、方法论到范式:全球治理的理论化	060
第三节 理论辨析: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主要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的比较分析	074
第二章 分析的路径:权威领域	086
第一节 定义权威领域:一种分析的工具	086
第二节 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权威迁移与全球治理	101
第三章 当代全球问题治理:作为个案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控制问题	120
第一节 当代全球问题的治理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 的个案意义	120
第二节 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理论与实践	132
第三节 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的缺陷和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全球治理	141

第四章 超越主权国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治理的	
主体分析	150
第一节 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时	
代的双刃剑	150
第二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超国家权威	167
第三节 公民社会:非国家权威	182
第五章 编织共同安全的网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治理	
的制度层次	206
第一节 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性的判别	206
第二节 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裁减和不扩散机制体系	216
第三节 关于当代全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治理制度的若	
干思考	223
第六章 把握和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治理的观念变革	234
第一节 认同、主体间共识、规范和当代世界政治	234
第二节 观念变迁和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球治理	242
第七章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治理的潜力与限度	259
第一节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权威领域的结构性解析	259
第二节 世界社会视野中的全球治理	269
第八章 未来的理论和理论的未来:全球治理论及其批评	278
第一节 未来的理论: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全球治理思	
想及其批评	278
第二节 理论的未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时代	285
后 记	293
主要参考文献	296
索 引	321

导论 超越国际政治时代的全球变革 ——全球治理及其理论化

第一节 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跨越冷战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

无疑,冷战的终结是动荡的 20 世纪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中最具革命性的事态之一。而对于以解释和预测世界政治变革为己任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来说,冷战的终结以及冷战后全球政治态势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似乎至少具有同样的革命性,众多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没能预测到冷战终结这一关键事态,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大量异彩纷呈的理论创新即为明证。毫无疑问,冷战终结对于人类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来说,都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从总体上来说,冷战最后以苏联的和平解体这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给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界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无论我们的理论变得多么精致,未来都难以被完整地预言”^①,预测未来并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甚至不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目的,但无疑它应该是评价这些理论有效性的重要参照系。事实上,诸多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将“预测国际关系发展的未来”作为自己的重要学术诉求之一。摩根索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认识世界政治变迁的模式,使人们可以理解国际政治,把

① 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史学集刊》2005 年第 4 期,第 1 页。

握当代事态的涵义,预测并影响未来。”^①结构论现实主义的先驱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指出,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具体的国家行为方面未必有效,但却应该可以预测在特定国际关系体系内带有特征性和模式性的变迁。^②科学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更认为,经过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国家行为必定会具有可靠的预测性。^③沃尔兹虽然认为具体国家和政治家的行为难以准确预测,但理论却可以解释规律性,使人们可以期待国际体系中各单元之间的互动结果必然会落入某些特定的范围。^④

毫无疑问,冷战的终结无论是从世界政治还是从国际关系角度,无论是从体系还是从单元层次上,都是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关键性事态。但是各个流派对于这一事态的预测性如何呢?很不幸的是,如美国著名外交史大师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批评的,二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⑤无一可以大致准确地预测到冷战的结束,更不用说冷战结束的时间和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为自己设定的预测任务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彻底惨败。^⑥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 4-5.

②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7), pp. xvii-xviii.

③ J. David Singer, "The Incomplete Theorist: Insight Without Evidence," in Klaus Knorr and James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66-67.

④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

⑤ 按照理论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研究议程,加迪斯从总体上把二战后到冷战前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三大流派:行为论(behavioral theory)、结构论(structural theory)和演进论(evolutionary theory)。每个流派都有一个庞大的理论谱系,其中包含很多不同的分支理论。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11-17.

⑥ 按照理论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研究议程,加迪斯从总体上把二战后到冷战前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三大流派:行为论(behavioral theory)、结构论(structural theory)和演进论(evolutionary theory)。每个流派都有一个庞大的理论谱系,其中包含很多不同的分支理论。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 50.